

第一章、導 言

「台灣究竟是不是國家？若是國家，應如何正名？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若非國家，那又是什麼呢？、、、

今日超過兩千一百萬的台灣住民身份究竟是什麼？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或既為台灣人又為中國人？此處作為語源的中國人又是指誰？

再者，現今存在於台灣的統治機構該如何定位？是『政府』？還是單純的『當局』？這個實際統治台灣的統治機構在國際社會中應被如何看待？」

～若林正丈¹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九七〇年代是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大幅萎縮的年代，台灣隨著中國代表權喪失的情況下，逐漸失去世界各國的承認，國家的合法性受到影響，國民黨轉而憑藉著經濟實力與財政汲取能力支撐政權的合法性與意識型態的解釋權，企圖延續著國家的獨立自主性。進入了一九八〇年代，國民黨統治政權面對的台灣情勢不只是國際環境困境，還包括了國家機器的衰弱、經濟的停滯發展與社會挑戰的興起，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在政治、經濟層面所面臨的危機正瓦解著其統治能力（governability）²與意識型態解釋能力。在政治上，國民黨政權面對的是內部的政權繼承問題與外部的反對運動持續發展；在經濟上，由於一九八〇年代民間與政府投資率持續性的下降，造成經濟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機。政治和經濟上的危機導致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大幅下降，社會挑戰力量的興起，國家所塑造出來的意識型態與願景遭到強大的質疑，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合法性面臨挑戰，民間社會對政治的觀感也由過去的消極與冷感轉向積極並且出現國家認同分歧的

¹ 若林正丈著，賴香吟譯，蔣經國與李登輝（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 1-2。

²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1996年），頁 65-66。

聲音³。

雖然蔣經國先生在晚年企圖以新的統治和調解方式整合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關係，但是在他一九八八年逝世前，這樣的國家社會重整計畫並未成功⁴。繼任的李登輝先生在任期初期面臨黨內嚴重的衝突與分裂，因而採取對外延伸國家機器範圍的作法，將台灣地方派系與民間資產家勢力引導入黨國體制的權力運作，企圖透過拉攏逐漸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抗國家機器內部的非主流派系。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李登輝先生成功地鞏固住他的政權，逐漸充實了國家的能力，同時為了加強國家自主性的地位，李登輝先生藉著舉辦一九九六年的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削弱代表中國的象徵意義，將台灣的國家機器重新改造，充分掌握國家機器。同時期，台灣的國家認同也在一九九〇年代出現明顯的變化，隨著國家機器被社會勢力的滲透，進行重新學習與改造的工程，以及國民黨內部嚴重的主流與非主流之衝突下，國家能力相對於社會能力而言是明顯地衰弱許多，因此，國家自主性的展現與政權合法性的延伸也擺盪在大中國的象徵意義與台灣人本土認同之間，甚至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出現台灣人認同超越中國人認同的情況（見圖 1-1）。國家自主性的展現形式、國家能力的轉變過程、社會勢力的興起等因素，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著巧妙的關係。

在經濟方面，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經貿崛起，台灣經濟則進入轉型時期，大量的傳統產業進入東南亞與中國大陸投資，大量的外資也相繼轉進前述二地，台灣的民間投資與外資投資逐漸下降，因此，大幅弱化了政府的財政汲取功能。國家機器遂改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態度面對遲滯的經濟發展與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對內開放中上游的產業領域，拉攏國內企業投資台灣；另一方面則撥劃「亞太營運中心」為對外經貿文宣主軸，吸引跨國企業來台投資，意圖創造其在經貿全球化浪潮下的定位，逐漸改善了台灣的經貿投資情況，使得

³ 朱宏源，「民國以來華人國家觀念的演化」，**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 1-36。

⁴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1996年），頁 72-74。

國家汲取能力與調控能力獲得提升，穩定了國家能力的獲得來源，並在本土化、中國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尋回國家自主性的地位。然而，轉型後的國家機器已經與台籍政經菁英密切結合，並逐漸擴展到從台灣下層社會獲得其合法性來源的渠道，使得國家機器欲求其在國際與兩岸關係中更明確的地位點，以保障其能力來源的取得。在此同時，台灣的國家認同趨勢在一九九六年之後亦出現「台灣人認同」穩定上升與「中國人認同」穩定下滑趨勢的現象（見圖 1-1、1-2）。國際情勢結構與經濟投資影響著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經濟宏觀調控能力、政府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影響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選擇。

二〇〇〇總統大選，代表台灣本土意識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勝出，民進黨與陳水扁先生為了使國家自主性在社會與國際重新展現，首先定義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的國名為「中華民國」⁵，其次對大陸的投資政策改採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立場，企圖透過優惠的稅率讓台商在台灣成立營運總部，達成管理大量台商至大陸投資的情勢。此時的國家機器將過去管制外的大陸台商納入機器的內部運作，國家滲透社會的能力與汲取資源的能力獲得延伸，而經濟產業的調控與轉型也達到階段性的轉型成果，再配合執政當局有意識地創造台灣史觀狀況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形成奠定在「本土政權」的論述上，國家的自主性地位也藉著「本土政權」的論述在社會與國際中重尋出路。當國家汲取能力與滲透能力獲得改善，國家自主性透過新論述重新展現，政權的合法性論述也獲得支撐的情形下，民眾的自我認同在二〇〇〇年之後也充分顯示出自認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遠超過自認為「中國人」國家認同的趨勢。

綜上所述，台灣從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作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威權黨國體制「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態存在過程中，已經培養出現代國家的輪廓，並且在國際空間與國內社會中具有了國家自主性與培養了國家能力。然而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隨著台灣國際空間的縮小與國內社會力量不斷的崛

⁵ 詳見一九九九年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起，國家能力相對於一九七〇年代以前是削弱許多，已經孕育出的國家自主性也急於尋找一個新的定位點與論述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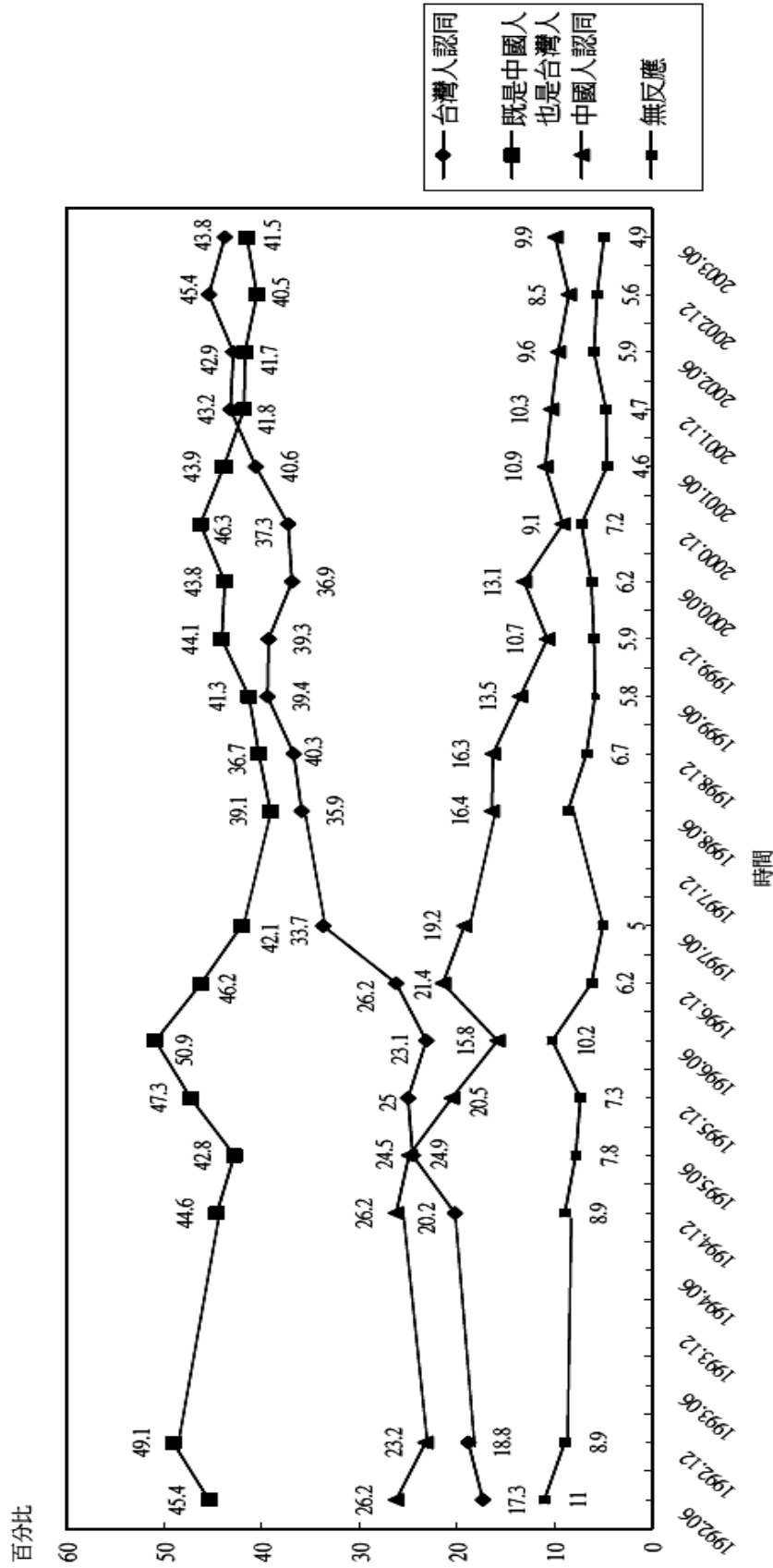
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認為國家需要不斷地在社會力量中尋找合法性，它是政權統治的基礎，也是政權需要自我維繫時自圓其說的過程，倘若國家政權在這個過程中無法維持有效的規範結構時，合法性就會出現危機，國家就不能獲得足夠民眾的忠誠支持，此舉將會發生認同危機，這時只要有足夠的社會族群開始挑戰國家的代表時，就有可能將政權合法性危機台面化，權力集團重組的時刻將會到來⁶。密格達 (Joel S. Migdal) 在分析第三世界的「弱國家—強社會」的關係時曾指出，弱勢的國家可以說是被存在的社會所合併，也就是國家會依著已經存在的社會力量，建立一個新的統治模式⁷。但是，當國家採用一個新的統治模式時，它也會遭到國家本身的抵抗，這些改變會影響到國家全體的凝聚，包括：國家資源再分配的能力、建立合法性的能力，以及達到整合統治的能力⁸。因此，無論國家能力發展如何，國家自主性將會為自己尋求一個定位支撐，並藉此定位支撐來充實國家能力，影響其政權合法性論述的解釋權，並進一步展現其自主性的地位。當台灣的國家能力相對於七〇年代以前呈現明顯衰弱，社會能力卻明顯強壯之際，台灣由於處在一個特殊歷史、地理狀態，使得國家自主性並沒有消失，國家機構與政府官僚正企圖尋求其新的定位點，藉以培養其國家能力，此舉也使得人民的國家認同也開始出現分歧與變遷，在此背景下，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就是希望更深一層來說明與發問：台灣人民國家認同變遷的根本原因究竟為何？而國家能力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因此，本文計畫的研究目的即是探討國家能力如何影響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

⁶ 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著，陳學明譯，**合法性危機** (台北：時報出版，1994)。

⁷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 Vivienne Shue (ed.),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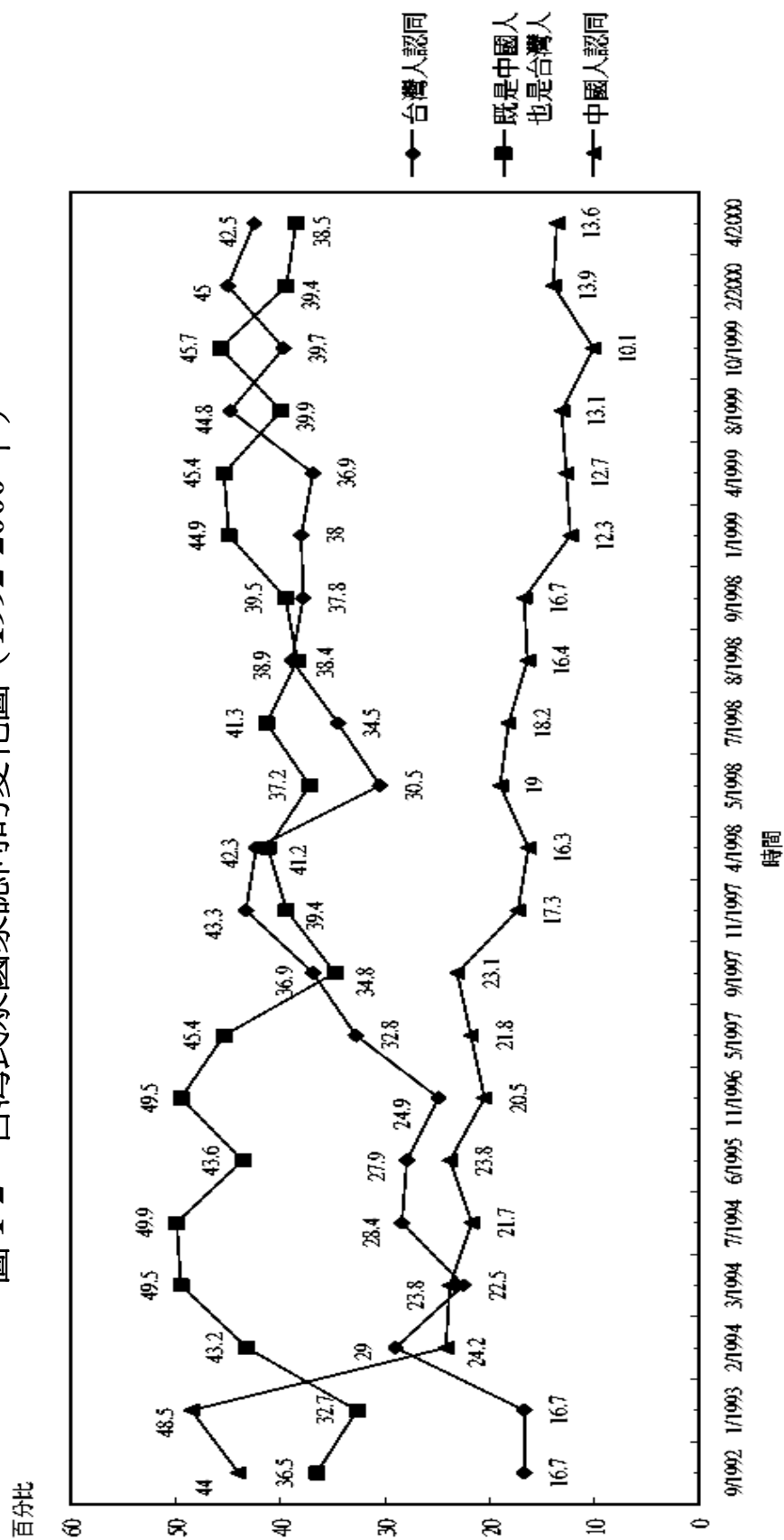
⁸ Ibid., p.26.

圖 1-1：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變化圖（1992-2003 年）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圖 1-2：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變化圖（1992-2000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陸委會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台灣的認同議題回顧

認同的問題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逐漸成為各國所要面對的危機，由此現實的危機衍申出許多學術界的討論，不同的學科對身份認同議題也會產生不同的切入觀點與解釋內容。傳統社會科學對認同問題的切入點概可分成心理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面向⁹，而台灣的認同議題分析主要可從政治學與法律學的自由主義、文化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民族主義、社會學的後學論述¹⁰等三方面作為切入點，形成不同的認同觀論述。

1、自由主義的認同觀

自由主義對國家認同的處理基本上是採取強調制度認同、降低文化認同的作法。它鼓勵一個自由民主體制中的公民應多思考自己所要認同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方面是否具備足夠合理的設計，而不是思索自己認同的國家是不是由一個同質性的族群所構成，以及她是否反映自己所鍾愛的文化風尚。自由主義認為民族主義追求的虛構集體認同之號召所付出的代價太高，不可能提供政治社會所需要的基本統一之共識基礎。相反地，這類的共識基礎只有政治經濟制度，當制度良善時，公民自然以自己的國家為傲；當制度不合理時，即便是強烈呼籲全國人民犧牲奉獻也不會有積極的回應。因此，制度的精進與否，遂成為衡量合理愛國心與合理國家認同的最佳指標¹¹。

在台灣，自由主義思想是在台灣社會面對國民黨政權威權主義之反應，自由主義的憲政認同強調個人權利，防止國家侵權的論述在八〇年代以前扮演非常重要的批判角色。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較少透過專著呈現，而是以雜誌文章

⁹ 可參考：石之瑜、姚源明，「社會科學研究認同的幾個途徑」，*東亞季刊*（台北：政大東亞所，2004），第35卷，第1期，頁1-36。

¹⁰ 後學論述包括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學說。

¹¹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出版，1998），頁110。

與報紙評論來闡述。其中，又以雜誌文章為主，包括一九五〇年代以貫徹自由憲政對抗共產專政為批判傳統的《自由中國》雜誌，六〇年代標榜五四精神提倡全面西化與現代化的《文星》雜誌，七〇年代標舉「革新保台」的《大學雜誌》，以及跨越七〇、八〇年代，以闡釋憲政民主觀念體系為首要之義的《中國論壇》等¹²。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由於新聞媒體的解禁使得以自由主義思想為號召的報章雜誌之重要性不再被凸顯，取而代之的是以本土學者為號召力而形成的「澄社」團體，以標榜自由主義信仰針貶政府為其職志。

然而，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雜誌之一貫特色是延續五四「民主、科學」的精神，強調在此精神下追求一套「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生活與其相對應之制度，藉以成為華人政治圈的典範。這樣的政治思想所衍申的認同觀在中國代表權的消失與國會全面改選等政治合法性內容轉移後，遂轉而出現統獨論述的對抗，使得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影響力呈現急遽下降的趨勢，民族主義為主的政治意識型態與其相對映認同觀在此之後完成更迭交替¹³，同時使得原本以承繼自由主義為號召的「澄社」團體在此趨勢的影響下，難免出現其民族主義的浪漫情懷¹⁴。

此外，由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各種歐美新興思潮由返國學人引進，使得自由主義的完整思想逐漸在台灣形成成熟的認同論述，同時造就了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務實性國家認同」論述，其內容包括了個人權利、多元寬容、立憲政府、國家中立、私有財產與市場經濟等原則，代表人物則是江宜樺、吳乃德、吳叡人、汪宏倫、林佳龍等。

2、民族主義的認同觀

民族主義源於浪漫主義的情懷，主張具有相同種族血緣、歷史文化、語言、宗教，或是共同生活習慣的人構成一個民族，這群人珍惜他們的民族遺產，不接

¹²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2001）。

¹³ 錢永祥，*縱欲與虛無之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314。

¹⁴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2001），頁304。

受其他民族的統治，因此要求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或是民族自治的狀態。

以民族主義方式論證國家認同，從而得出台灣必須與中國統一的理論一直是國民黨遷台以來，官方所提倡並容忍的唯一說法，並成為國內公民教育的主流。即便是以批評國民黨施政的自由主義學者，或是左翼知識份子也不排斥在國家認同問題上採用上述民族主義式的思維，這其中包括了王曾才以中華民族的種族血緣文化為主要根據，說明中國統一的必要性¹⁵；胡佛以肯定中華民族的整體尊榮感為前提，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¹⁶；陳映真以想像的漢族主義解釋歷史上一切有關的中國概念和情感¹⁷；陳昭瑛則透過新儒家的文化詮釋，企圖為中國認同創造吸引力，消弭台獨認同的內容¹⁸。

同樣的，民族主義的獨派人士雖然也是以種族血緣、歷史文化、共同生活經驗為其台灣認同的支撐基礎，但是這些支撐基礎與中國認同的論述內容差異並不大，使得民族主義的台灣認同論述常會發生獨派陣營的內部批判現象¹⁹。民族主義的台灣認同論述主要是以早期的廖文毅、簡文介、史明、王育德為主，而李喬、陳芳明、盧建榮、林濁水、王拓、張茂桂等則是當前思潮的學者，他們主張台灣的移民在四百年來遭受外來政權統治，在歷次反抗運動中以孕育獨特的海島文化，此歷史發展與中國大陸有別，其文化型態兼容並蓄，故台灣雖與中國有部分重疊淵源，但是目前已經完成一獨立完整的命運共同體²⁰。

3、後學論述

現代政治的認同觀在後現代時期已經處於危機狀態，原因包括了政黨政治的沒落、國家政治的衰微、國族政治的退位、左右翼之分的泯滅以及公共領域的萎縮等，此外，後現代主義興起的政經因素還有東歐解體的衝擊、全球化的影響、

¹⁵ 王曾才，「中國的國家認同與現代化」，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

¹⁶ 胡佛，「政治文化與青年的國家認同」，*中國論壇*（台北），第15卷，第12期，1983，頁16-19。

¹⁷ 陳映真，「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收錄於施敏輝主編，*台灣意識論戰選輯*（台北：前衛，1988）。

¹⁸ 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台北），第23卷第9期，1995，頁6-43。

¹⁹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出版，1998），頁148。

²⁰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出版，1998），頁150-151。

多元社會的促進與消費主義的昌盛等，使得現代政治的同質性、統合性、理性、自主性、穩定性的認同觀轉而成為後現代的多元與分裂的認同。後現代的政治認同強調的是差異政治的原則與策略，主張認同是來自論述的型塑與限制，而落實於實際的政治層面則顯現於新社會運動上，後現代政治認同將不再追求普世涵蓋的國家認同，而是國家之內各個不同的社群認同。孟樊以九〇年代新興的社會運動以及二〇〇〇年宋楚瑜以無黨籍身份獲得四百多萬總統選票為例，說明後現代的台灣政治認同將展現在新社會運動的實踐上，而非國家認同²¹。

自從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後殖民理論在全球化時代興起風潮後，台灣的認同論述也同時捲入後殖民主義的漩渦中。後殖民主義主要是指在全球化時代的架構下，目前所處的時代仍然沒有超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殖民化」展現在對「相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上進行資本壟斷、在社會和文化上進行「西化」滲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習俗，從而弱化和瓦解當地居民的民族意識。而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則具有對被殖民經驗的反省，與拒絕殖民勢力的主宰、抵制以殖民為中心的論述觀點，並且呼應後現代主義強調文化差異多樣性的「去中心化」（de-centring）傾向。代表的學者邱貴芬、廖朝陽、廖咸浩、廖炳惠等。

二、國家能力影響認同的文獻分析

在國家能力影響認同的文獻分析中必須將諾丁傑（Eric A. Nordlinger）對國家自主性的明確規範與分析架構先行介紹。諾丁傑在**民主國家的自主性**（*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一書中，以公共政策的產出過程為例，探討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影響關係，書中將國家視為一個主動積極地追求其偏好的角色，可以說是新國家主義研究中，率先將國家視為獨立變數的代表作²²。諾丁傑書中

²¹ 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出版社，2001）。

²² Eric A. Nordlinger,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的分析是建立在以下六個論點上²³：

- 1、國家的偏好與社會的偏好有時並存，有時排斥。
- 2、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不是相斥時，官員會把他們的偏好轉變成決策。
- 3、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不會相斥時，官員常利用國家自主性強化國家能力，防止社會偏好不同於國家偏好。
- 4、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相斥時，官員常利用國家自主性強化其能力，轉變社會偏好，聯結社會資源，迫使社會偏好不會背離國家偏好，再把官員的政策轉化成國家的權威決定。
- 5、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相斥時，官員常利用國家自主性強化其能力，使官員不會受到社會偏好的束縛，然後使官員的偏好成為權威性的行動。
- 6、當國家與社會的偏好相斥時，官員常依靠國家部門的職能，轉化其偏好而成為權威性的決定。

由此可知諾丁傑的國家自主性具有三個基本概念：國家、國家偏好、權威性行動等²⁴。諾丁傑的國家雖由官員組成，但是其自主性是自生的，並非因為社會影響而產生。這種自主性的自生源於官員的事業興趣、效忠組織的特性以及專業技術的交互影響²⁵。

史卡區波（Theda Skocpol）在國家自主性是自生的前提下，進一步將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分開來加以陳述。史卡區波認為國家能力可以藉由官僚體制的建立培養、歷史時勢的把握與國際現實的支持等因素來強化之，國家能力的強化將會進一步發展國家的自主性，反之亦然²⁶。史卡區波以法國、俄國、中國的革命為例，說明上述因素的國家能力強化將使得社會的強力團體與國家機器的幹部對國家機器合法性產生認同²⁷。

²³ *ibid*, p.7.

²⁴ *ibid*, p.9.

²⁵ *ibid*, p.15.

²⁶ Theda Skocpol & Kenneth Finegold,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New De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7, 1982, pp.275-278.

²⁷ Theda Skocpol著，劉北城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

王紹光與胡鞍鋼以國家能力的概念分析中國的中央政府在面對經濟成長、國家能力下降的情形下所應扮演的角色是更加強國家汲取財政的能力，藉以進一步提升宏觀調控經濟社會的能力與強制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以避免國家合法性的衰弱形成的認同變遷現象，此舉也將會造成國家分裂與社會解體²⁸。

魏思與霍布森 (Linda Weiss & John M. Hobson) 的研究將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的概念架構與個案詮釋的特性結合起來建構一個新的研究方向²⁹，他們以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為主軸，根據國家統合能力與社會對抗國家干預能力為分析的兩面向，將國家與社會關係分別依據強、弱性質的不同而劃分出四種主要的國家類型³⁰，這四種類型分別是：國家統合能力強，社會對抗能力強的彈性國家 (Flexible State)；國家統合能力弱，社會對抗能力強的服務性國家 (Service State)；國家統合能力強，社會對抗能力弱的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 State)；國家統合能力弱，社會對抗能力弱的掠奪型國家 (Predatory State)。密格達 (Joel S. Migdal) 則用此概念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的弱國家、弱社會情勢之產生通常是在巨大事件變動後，如自然災變、戰爭等而影響到原本社會控制者的資源取得與認同來源，這將威脅到人民的生存。這種弱國家與弱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在密格達眼裡被認為是無政府的狀態，此狀態造成認同的嚴重分歧，如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中國與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墨西哥³¹。

李琮進一步指陳第三世界國家因為社會階級結構在脫離殖民母國後進行大幅度的改變，社會傳統的家族、部落、教派團體林立，官僚貪污腐化嚴重，以及國內嚴重的種族對立等情形解釋第三世界國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國家能力的衰弱將造成政局惡化，經濟惡化，這勢必會拖垮政治的合法性與認同度而陷入無止盡的惡性循環中³²。

²⁸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²⁹ Linda Weiss, & John M. Hobso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³⁰ *ibid*, pp. 243-244.

³¹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3-34.

³² 李琮，*第三世界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 421-422。

將國家能力的研究途徑來探討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或是探討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互動的相關文獻相當豐富，可是由國家能力的研究途徑來探討台灣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以及國家認同轉變的文獻仍屬少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若林正丈，以及王振寰與錢永祥。

杭亭頓認為台灣一九八九年時期的台灣與巴西、土耳其一樣，都受到一向被排除在分享權力圈子外的政治反對力量的挑戰，而這些反對力量都把國家認同當作挑戰的訴求，台灣的國家機器在面對越來越強大的反對力量與社會團體時，為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國家只能採取兩種方式處理，一種是繼續把這些反對力量排除在權力圈外，不論是用民主或是不民主的手段；另外一種則是政權進行自我調適，在國家認同的意識型態上進行改變，甚至於根本就放棄它原來的意識型態³³。文中，杭亭頓已經說明了台灣的國家機器在面對社會力量挑戰時已經逐漸失去了過去歲月的自主性與能力，國家機器勢必要對社會的挑戰力量、國家的認同分歧有所回應，藉以求得國家政權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可是，杭亭頓卻沒有明確解釋出為何台灣的執政黨選擇了自我調適國家認同的意識型態改變，而沒有繼續把反對勢力，以及反對勢力的意識型態排除在國家的權力之外，亦即杭亭頓沒有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解釋清楚。

若林正丈的《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一書中，將台灣威權體制的政治控制及社會控制進行非常細緻的描述，雖然若林正丈不是有意識地呼應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途徑，但該書對於國民黨國家何以擁有可以控制國家結構的能力，著墨相當多，可以說實質上對於台灣的國家能力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³⁴，但是，由於若林正丈的一書中旨在介紹「後蔣經國時代」台灣黨國體制的變遷過程，所以，對於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種種特徵，尤其是政治認同的變遷等現象的基本原因並沒有詳細說明。到底是因為國家能力的衰弱，使得經濟力的本省人向政治力的外省人挑戰，造成國家機關與認同的變化？還是國家機關主動因應這種政治力和經濟力

³³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ontext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Keynote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1989, January).

³⁴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之間的矛盾問題，促成國民黨不得不進行「本土化」的原因呢？若林正文並沒有觸及。

王振寰與錢永祥認為台灣社會在七〇與八〇年代的國際情勢轉變與反對運動有組織性的興起過程中，伴隨產生出「國家認同」的爭議，這個爭議在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體制轉型下更加激烈，不論執政的國家機器或是反對的在野黨派都想加入「想像共同體」的架構行列中。王、錢的文中甚至認為台灣的國家機器在此過程中，已經全面加入召喚台灣人民邁向新國家的使命，使得國家認同出現變化。因此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觀察點必須分別從政治與社會的轉型著手，而不應只是單向地偏重於社會面³⁵。

第三節 研究途徑、分析架構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途徑

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台灣學界普遍以憲政自由主義、浪漫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為研究途徑，試圖分析與解釋台灣國家認同變遷之現象，可是上述研究途徑並無法有力解釋台灣與大陸在文化歷史血緣地理等因素相近，民間社會又高度互動的情況下，卻在一九九〇年代呈現出國家認同往台灣人認同傾斜的現象，因此，本文希望以「國家」角度出發重新解釋上述的現象，新國家主義遂成為本文所依循的研究途徑。

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的新國家主義強調：第一，國家的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第二，國家本身具有特定的目標，並成為制訂公共政策的一個要角；第三，透過國家意志及目標的實現，國家可以改變政治生活的本質。因此，「國家」在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的學者眼中，將不再僅僅是各種政治利益的角力場。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重新重視國家的重要性並非排拒原有多元主義，或是排拒其他專門針對

³⁵ 王振寰、錢永祥，「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1995）第二十期，頁 17-55。

階級、團體等分析單位的研究，相反地，其主要目的是將國家重新拉回研究的舞台，從歷史長期流動變化的觀點中分析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轉變，從而掌握政治生活和政策制訂的原動力。因此，新國家主義除了不具有排他性以外，還具有重視長期歷史的分析，著重國家相對於社會的能力及自主性的互動過程³⁶。

換句話說，國家將透過正式的政策執行工具，以及非正式的約定俗成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實際運作中，這種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必須要放在總體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相關歷程，並且在此歷程中分析長期間的國家目標及國家行動的持續與演變，才能更清楚的瞭解國家如何建構、解構、疏通，以及限制社會利益的發展。當然，新國家主義除了縱向的深度歷史分析外，也講究橫向的跨國比較分析之基本單元，再透過歷史的長期分析，新國家研究途徑將可以建構出一個立體的分析網絡，以避免個案分析以偏蓋全的缺點。

二、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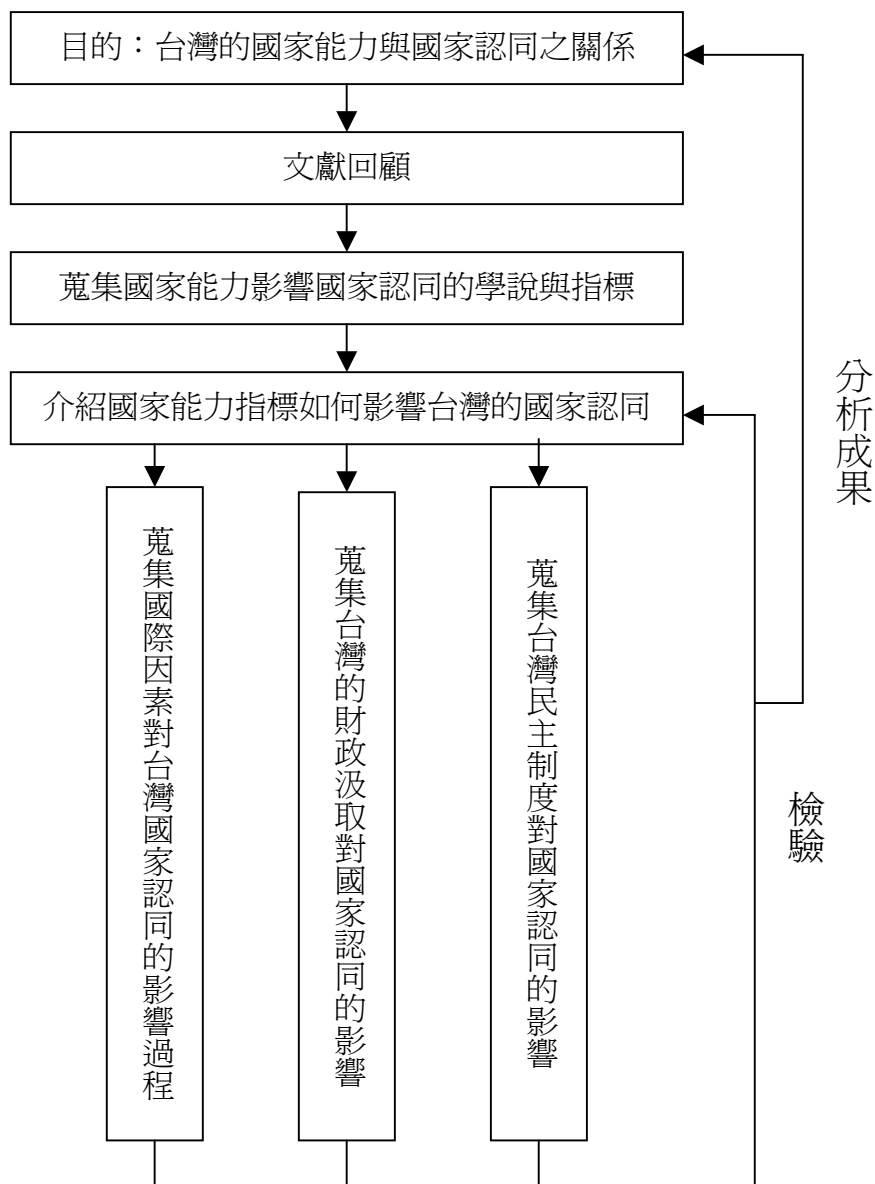
由於新國家主義的研究途徑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逐漸興起，因此，以國家能力作為衡量各國的政治與社會之關係，說明各政權的的合法性能力的興衰已經成為一成熟的研究方向，本文也是在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的方向上，說明台灣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滲透入台灣社會的情勢，鞏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藉著國家認同的評斷標準佐證台灣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滲透社會的情形。至於本文的國家能力影響國家認同的分析指標則是以國際結構、財政汲取與民主制度等三項作為分析指標，在此三項指標下形成如下圖 1-3 的分析架構與研究步驟。

本論文的研究步驟計畫先從蒐集國家能力影響國家認同的學說開始進行指標的界定，相關指標計有國際結構、財政汲取與民主制度等三項，在此三項指標中，本論文將蒐集與說明台灣在一九七〇年代至今的國際情勢轉變之歷史、財經

³⁶ Dietrich Rueschemeyer, Huber Evelyne Stephens, John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5-6.

政策與相關統計之數據，以及民主化之開放進展過程。以上三項指標內容中，本論文將依序分析上述指標內容與政大選研中心及陸委會自一九九二年以來的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統計數據間的變化進行說明（見圖 1-1、圖 1-2），期望能說明台灣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的發展狀況與探討出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轉變的原因。

圖 1-3：研究步驟計畫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此分析架構中，本論文需要大量的文獻資料與統計數據，因此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與統計比較法。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歷史文獻資料已經相當充分，所以這將不會形成研究進行的困擾，反而在統計數據的取得有較多的困難，其中，台灣在九〇年代以來的國家認同統計數據與台商對外投資的精確數據會是最難取得的統計資料。在台灣國家認同的統計數據方面，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有較長期觀察與統計的單位只有陸委會與政大選研中心，因此，本論文將分別羅列上述兩單位的統計數據，作為國家認同數據的資料參考，希望能勾勒出自九〇年代以來的國家認同趨勢；其次，由於台商對大陸投資的數量始終是個難以確定的資料，所以本論文需要的台商對外投資的數據資料將會是一大挑戰，因此本人希望透過外貿協會以及兩岸民間社團的幫助瞭解台商到大陸投資的情況，估計出台商對外投資的大概額數。

三、研究目的

哈伯瑪斯以國家需要在社會不斷地尋求合法性，藉以獲得人民的忠誠支持，然而，倘若國家失去了創造合法性的能力，其合法性將出現危機，進而發生認同的危機，此時只要有足夠的社會力量或團體挑戰國家的代表時，將可能使得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台面化，進一步形成權力集團的重組契機³⁷。史卡區波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中說明一個政權崩潰的原因，並不能只是簡單的導因於政權體制的合法性在自己幹部及其他強力團體眼中的消褪而已，相反地，史卡區波進一步認為政權體制合法性的衰弱只是一個中介變數，政權崩潰的根本原因應該是在國家組織的結構和能力的表現，而國家組織的結構和能力的表現可以從國內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國外的條件和壓力做為分析的切入點³⁸。本文希望結合哈伯瑪斯將認同變

³⁷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著，陳學明譯，**合法性危機**（台北：時報出版，1994）。

³⁸ Theda Skocpol著，劉北城譯，劉北城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頁36。

遷導因於政權合法性的危機，以及史卡區波將政權合法性衰弱歸因於國家能力的消褪等兩論點，嘗試用國家能力的轉變解釋台灣人民國家認同變遷的過程，預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學術上將西方的理論嘗試用來解釋台灣的情勢外，還希望能提供台灣的社會、國家與企業一個重新看待台灣國家認同變遷的新情勢與其原因。

在政治發展的研究理論中，「認同危機」一向被視為政治體制亟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而民族國家的建立有助於解決歸屬感的兩難³⁹。相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狀況，亞、非、拉美等國家雖然將民族自決的方法與民族國家的建立視為政治運動的最終手段，但是，這些國家的認同危機卻不僅只是限於發展理論中的傳統／現代的認同危機，殖民關係的後續影響更進一步影響著這些新興國家的認同危機，台灣的情況是典型的代表。台灣在近四百年的政治發展中，是典型的殖民或準殖民的統治歷史，在其中的多重殖民經驗已深植在台灣集體記憶與文化構成中⁴⁰，因此，台灣的多重殖民經驗造就出特殊的認同問題。當代台灣的認同研究中可以從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等兩大理論中做分類⁴¹，民族主義是典型的浪漫主義延續，它嘗試從鄉土的情感、受壓迫的悲情、特殊的歷史經驗與生活方式、相同的價值觀念等，找尋集體的認同，藉此塑造中華民族或台灣民族的主體性；自由主義的認同是以「公民」的角度作出發，是理性主義的反射，它是在認同自由憲政體制及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的基礎下，形成整合政治社會內部多元分歧的共識。然而，無論是單一方面的從民族主義，或是從自由主義來看待台灣的國家認同都失之偏頗，難免會限於社會多元主義以社會為中心的迷思—過於將社會力量誇大，忽略了國家的自主性，而且此舉也難以解釋全球化現象對台灣人認同的影響⁴²。因此，跳脫傳統的從民間社會角度以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研究途徑出發

³⁹ 白魯洵 (Lucian Pye) 認為政治發展過程中是一個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會出現一系列的政治危機，包含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參與危機、分配危機等而認同危機的表現在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認同掙扎。詳見 Lucian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⁴⁰ 包含了荷蘭與西班牙殖民統治、明鄭準殖民統治、清朝殖民統治、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準殖民統治等殖民經驗。

⁴¹ 詳見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出版社，1998）。

⁴² 例如哈日風潮、哈韓風潮等趨勢對年輕一代認同的影響，以及TVBS在2003年8月19、20、

來探討「認同危機」是學界必要的嘗試，尤其在如今全球化的時代，強調全球治理的概念⁴³，從各個治理的節點來綜觀全局可為傳統研究途徑的突破點，而本文從新國家主義的研究途徑，希望以國家的角度出發，強調動態與兼容並蓄的觀點來分析台灣的國家認同就是此嘗試之一，也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擴充解釋認同現象變遷的學術理論與運用。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研究限制

一、名詞解釋

「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

新國家主義的國家能力概念承襲自韋伯 (Marx Webber) 的理論基礎，韋伯在分析國家能力時，主要是從政府統治能力 (governability) 來作分析，統治能力是指國家合法使用獨佔性權力的活動能力⁴⁴。史卡區波 (Theda Skocpol) 由此基礎延伸定義國家能力為國家貫徹自己政策目標的能力⁴⁵。密格達則將國家能力定義為一國中央政府影響社會組織，規範社會關係，集中國家資源，並加以有效分配或使用的能力⁴⁶。王紹光、胡鞍鋼接受密格達的觀點認為國家能力是指國家將自己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⁴⁷。綜合以上學者所述，本文認為國家能力是指國家將其政策目標和意志滲透到社會，有效發揮其影響力的能力，可以分為國

21 日所做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七年級生，希望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州，希望與大陸統一的有 36%，這與接近半數的成年人，希望與大陸統一的民調數據相比，顯示七年級生較傾向成為美國的一州，交叉分析顯示，七年級後段班希望台灣成為美國一州的比例，比七年級前段班，高出了 19 個百分點。詳細內容見：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tzeng20030902171612

⁴³ 「治理概念」相對於「統治概念」，亦即國家、社會、企業、第三部門、等都處在平等的地位治理全球事務，詳見：李英明、張亞中合著，*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台北：生智文化，2000）。

⁴⁴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8.

⁴⁵ *Ibid.*, p.9.

⁴⁶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

⁴⁷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4。

家汲取社會的能力、規範社會的能力、控制社會的能力、適應社會的能力等作為具體的指標內容討論分析。

「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

新國家主義學者往往將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並列討論，認為國家能力可以用來描述國家自主性的限制點，也就是說：國家自主性討論的議題是國家擁有主動制訂政策的地位，是國家能力為何發展的中心要素⁴⁸。因此，本文認為國家自主性指的是國家自認為可以控制其領土內之人民、社會與階級等的組織主體，達成國家行動者所設定的特定目標，而並非僅只是單純地反應其所掌控領土範圍內的社會、階級或團體的利益與要求之舞台。

「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國家認同是依據政治學所做出的認同觀。政治學所研究的認同，是指在主權國家已經建立且被承認的基礎上，指涉「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認為這個國家的認同是指領土範圍之內所有人所共享的成就，並與疆域之外的人處於互不信任，隨時會進入敵我對立的狀態。國際政治學家認為：兩國無論文化、宗教信仰如何相近，仍不可避免有衝突，因此，沒有任何兩者之間是永久的盟友或敵人，各國領土疆域會因應權力的大小發生變化⁴⁹。這個號稱為現實主義的基本態度，與現代國家的國家認同息息相關，因此而形成的「團體」(group)，稱為「國民」(state-nation)」，與以共通血緣、文化想像為基礎的民族(ethnic)不同。結果造成相同民族(ethnic)的人若分屬不同的國家，因為被另一個主權秩序所管，所以將會形成不同國家的國民⁵⁰。政治學認同觀最常處理的現象是：由於後殖民國家常見到民族認同的力量超越主權認同的力量之情形，此種認同差距常被主流基督教國家菁英所質疑是否形成主權國家的理由，因此政治學家試圖說明，同一民

⁴⁸ Joel S. Migdal, *ibid*, 1988, p.397.

⁴⁹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⁵⁰ Edward Mortimer, (ed.), *People, Nation and State: The Meaning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I. B. Tauris, 1999).

族的人不能自由往返跨越主權國家之原因，與同一民族在不同主權國家卻受到忠誠質疑的理由。這種以「敵我區隔」所建立的認同，是政治學經常用來研究認同的角度⁵¹。因此，本文認為，當代政治學理論認為現代國家（state）需具有領土、人民、主權、政治制度等要素，在此國家領土內的人民稱為「國民」(state-nation)，此國境內的所有國民被理想性地認為認同該國家及其國內的憲法規章與歷史，形成一想像出來的共同體。本文以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一詞取代民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希望以政治學角度來檢驗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國家能力之關係，藉以區分民族學的認同方法。

二、研究限制

由於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相當靠近中國大陸，歷史上又有深厚的中國意識，安全上又受到中共的威脅，使得認同問題格外受到政府與社會的關注，此舉難免會牽涉到政治上的統一與獨立、領導者對「中國」的映象等意識型態的困擾，因此，本論文會儘量避免談論統獨的議題、統獨相關統計數據，以及領導者意識型態等因素，希望能夠單獨的從台灣的國家能力興衰與轉變來看待其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但是，隨著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磁吸效應、在政治上的崛起強國姿態，以及中共強力的統戰宣傳下，未來的台灣國家能力削減與國家認同趨勢等研究勢必要將中國大陸的興起列入重要的影響因素，而此方向可以為政府施政提供參考，更重要的是提供有志於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的學界下一個努力方向。

⁵¹ 政治學封閉的知識論亦面臨自我的檢討，詳見Michael J. Shapiro and Hayward R.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